

文 / 吴 萍

周恩来 与“一五”计划



1953年6月28日，周恩来关于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的修改问题致毛泽东等的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都很严峻。国际上，是尖锐对立的冷战局面。美国对华采取极端敌视的政策；在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政治上颠覆。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边抗美援朝，边恢复经济。1952年间，周恩来便着手主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一部分，主要是对全国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实践证明“一五”计划的实施对百废待兴的中国工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以后中国“二五”计划、“三五”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领任务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三年时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责成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经周恩来提议，会议决定由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陈云（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薄一波和李富春（中财委副主任）、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宋劭文（中财委秘书长兼计划局局长）共6人组成领导小组，领导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周恩来与编制领导小组加紧研究制订“一五”计划方案。到1952年6月，中财委汇

总各大区和各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勾画出了中国有史以来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幅宏伟建设蓝图草案——《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

要在短时间内完成长期计划的编制工作是不可能的，只能一面进行建设，一面编制，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工作的重要特点。周恩来深深感到时间已十分紧迫，他需要集中力量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状况，研究五年建设的任务，以便向中央提出全盘性的建议，并准备同苏联会谈。争取苏联对我国建设的援助，是中央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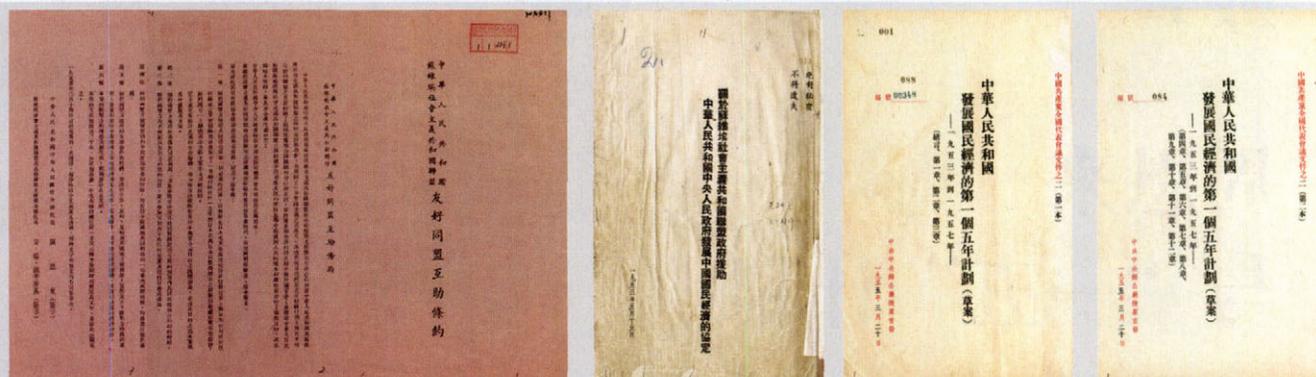
为了保证这次访苏的圆满成功，从1952年3月起，周恩来便着手进行准备。

赞颂《沁园春·雪》者有之，曲解、丑诋者也有之，革命文人、进步文人与反动文人之间围绕着《沁园春·雪》在报纸上展开了一场文枪笔战，形成了一场风波。国民党反动势力非常恼火，可又无可奈何。这首诗词公布于众，扩大了毛泽东及共产党的影响力，使广大民众认识到毛泽东是一个即有武功又能文治的人才，使得社会知名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表示支持和理解。民族复兴有望，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人们从《沁园春·雪》中看到的“北国风光”，不仅是陕北的雪景，更是陕北延安的人才汇集，未来中国新希望之所在，也只有这样的“风流人物”，才能成为未来中国的脊梁。

《沁园春·雪》写于1936年。长征到达延安后，党中央在陕北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会议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化，讨论并决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克服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统一了全党思想。为了更好地巩固苏区根据地，“猛烈扩大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毛泽东等组织了“东征部队”开通抗日前进道路。这次历时70多天的

东征，扩大了红军近万人，筹措了抗日经费，在晋西广大农村建立了革命政权，使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深入人心。1月底，他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并作了报告，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加快了东征的战备步伐。2月5日毛泽东住在清涧县袁家沟，这里东距黄河20华里，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河流交错。1936年初，陕北普降瑞雪，足有2尺多厚。2月6日，再次飘洒了一场大雪，皑皑白雪把袁家沟装扮的分外妖娆，毛泽东心情非常愉快，2月7日深夜，即兴写下了诗词一首——《沁园春·雪》。

（作者单位：中央档案馆 100095）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的签字仪式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图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文文本

苏联援助中国经济的协定

“一五”计划草案

同年七月初,先后辞去多项兼职,并致函毛泽东:“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其它工作当尽量推开。”又说:“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当天,毛泽东予以批准。1952年8月11日,由周恩来主持制订的《中国经济状况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终于完稿,该文件强调五年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这一文件及时译成俄文,以便和苏联进行谈判时,提交给苏方。同时,他还亲自起草了《关于三年来中国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五年计划初具眉目。那时在国家计委工作的王光伟回忆道:“总理亲自指导编制计划,审定计划。他工作非常细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要过问,几乎第一个百分比他都要亲自计算,有些数字差错往往是总理纠正的。”正是这段时期紧张的工作,损害了周恩来的健康,他鼻血不止和心律不齐。

争取外援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65人,于8月17日抵达莫斯科,受到莫洛托夫等的热烈欢迎。美国驻苏大使凯南立刻向其政府报告了此事。周恩来此行的目的,除了就一些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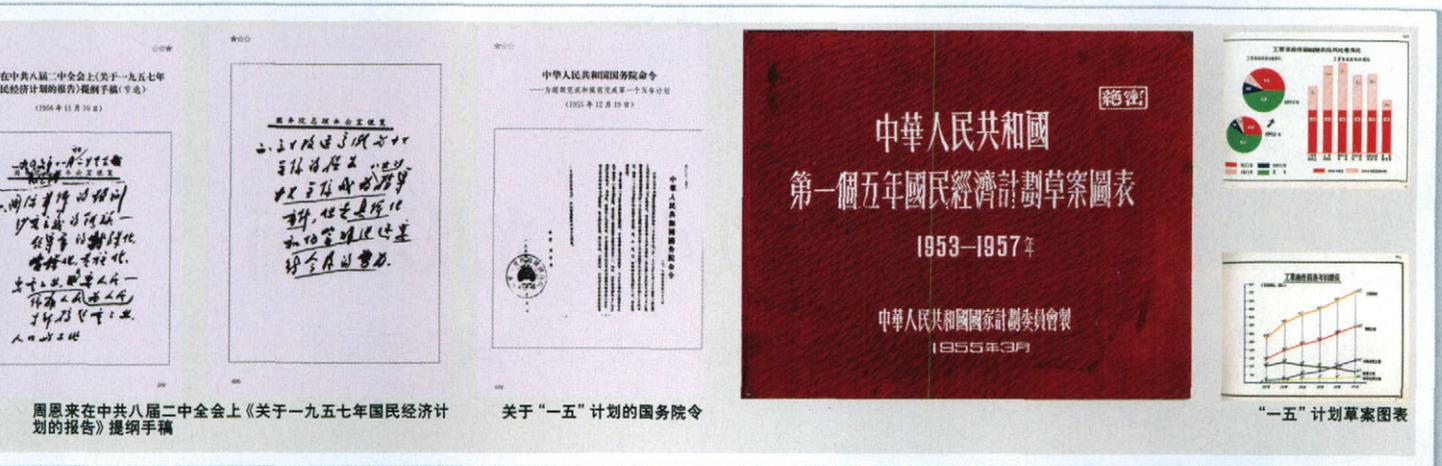
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外,主要是寻求苏联政府的经济援助。希望苏联政府协助解决地质勘探、工业设计、工矿装备、器材定货、技术援助(包括专家、留学生、实习生、蓝图等),并争取中国五年计划装备订货中的贷款差额由苏联政府贷款。斯大林对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来访高度重视。在一个月时间内,先后2次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会谈。周恩来全面介绍了中国国内情况,着重介绍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设想,主要内容是:(一)中国的经济状况;(二)五年建设的方针;(三)五年建设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斯大林对周恩来的全面介绍给予了积极的反应,明确表示,苏联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制订计划,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中国政府代表团同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组成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商谈。9月15日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9月22日,在签定一系列文件后,周恩来、陈云等离开莫斯科回国。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职务,仍留在莫斯科继续与苏方逐项具体磋商。

回国后,周恩来继续关注和直接过问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进程,及时审阅请示电报,及时给予明确指示和答复。

1953年年初,在斯大林去世前不久,周恩来又秘密前往莫斯科。他衔毛泽东之命会见斯大林,并再次要求苏联为中国工

业化提供广泛援助。苏方在叶卡德琳娜宫为周恩来举办了一个小型午宴,苏方约有12人参加。这时斯大林的气色已很不好。午宴上,斯大林强调,苏联人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在中苏关系的发展上袖手旁观。会见中,周恩来回顾了刚刚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强调这个条约显示了历史所证明的苏中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他还谈到了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粉碎日本关东军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谈到关键处,周恩来再次通报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情况,指出该计划的核心是工业化问题。周恩来表示,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有苏联方面的广泛援助才能实现。接着,周恩来非常具体地谈出了中国方面的要求。斯大林答应苏方将继续与李富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谈判这些问题。同时,斯大林表示,这对苏联的压力并不轻。因为苏联目前也正面临着卫国战争之后大规模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同年3月8日,斯大林病逝。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专程吊唁。利用工作间隙,听取了李富春等同志关于中苏商谈“一五”计划轮廓的情况汇报。同时,与苏联新领导谈援建问题。后仍留下李富春继续谈判。4月4日,米高扬向李富春通报了苏共中央,苏国家经委对我国“一五”计划的意见。4月8日,周恩来约见奉命回国汇报中苏会谈最新进展情况的宋劭文,详细询问了苏联政府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4月30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李富春的电文,就双方谈判进程及其结果的中方立



场给予了明确指示。电文称：“请向米高扬表示：(1)中共中央、中国政府与毛泽东完全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八个文件，并完全满意和感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这样巨大的全面的长期援助。(2)授权李富春为全权代表签订这些文件。”5月15日双方签署《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等8个文件。协定规定：1953~1959年苏联将援助中国兴建91个工业企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的50个，共计141个。斯大林逝世后两个月，双方就签订了这个协议，这是周恩来全力推动的结果。1954年再访莫斯科同年156项全部立项。

自此，历时8个多月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援助新中国“一五”计划建设的会谈，获得圆满成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这次会谈所获得的成就，都充满了欣慰和喜悦之情。

编制计划

1953年6月28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对《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大到进入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后党的基本任务，小到个别容易产生误解的词语，无不体现了周总理富有远见的战略筹谋和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1954年4月，中央成立了编制五年计划纲要的八人工作小组(陈云、高岗、

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由陈云担任组长，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始编制详细具体的“一五”计划草案。由于此时党已经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苏联援助我国的建设项目已经确定，同时经过1953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发现了不少问题，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编制详细具体的“一五”计划草案的条件基本成熟。在上述背景和原有计划草案的基础上，陈云组织了各有关方面开展了工作量很大的编制工作。同年6月30日，陈云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中，对编制“一五”计划时各项主要比例关系和增长速度的安排，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8月份，在陈云和李富春的主持下，8人小组审议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接连举行了17次会议，对草案逐章逐节地进行了讨论和修改。9月份，8人小组将修改后的“草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认真审阅了这个初稿，逐行逐句圈点，作了许多批注，并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阅。10月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又在广州集中，用一个月的时间共同审核该“草案”，并由李富春等陪同以备咨询，留朱德、陈云、邓小平在主持日常工作。11月份，由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11天的时间，仔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又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个计划

草案发给中央各部委党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讨论，并要求各省委应特别注意本省的农业发展计划。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专门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这个计划草案，并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颁布实施。会后，中共中央又根据会议讨论中提的意见，并再次征求苏联意见，对其作了适当修改，然后于6月10日将其提交国务院。

1954年9月，编制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1954年11月，周恩来和毛泽东、李富春等来到广州，审核修改所提计划草案。1955年3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原则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6月27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对将要提请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作了说明。7月6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5年的努力奋斗，到1957年底终于超额完成了计划指标，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为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却是十分重要的物质基础。周恩来作为“一五”计划的总设计师，日夜操劳，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别人难以替代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央档案馆 100095)